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历史演进、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

黄一玲

〔摘要〕 发展是现代性的核心叙事,执政党的发展观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轨迹,需要在嵌入性意义上对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予以考察。社会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社会矛盾的转变以及人民需求密切相关。从党在革命时期坚持群众路线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从改革驱动型发展到以人为本推进科学发展,党始终坚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及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精髓,在不断深化对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中进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积极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形成“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引领新时代发展。

〔关键词〕 人民;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生成逻辑

发展是现代性的核心叙事,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议题,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等环境下展开的,由此需要在嵌入性意义上对影响发展的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予以考察,据此才能对不同的发展观及其历史演进有一个总体性透视,从而明确不同发展观形成演进之启示。

发展观是有关发展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涉及对“为何发展”“如何发展”以及“为谁发展”等理论命题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到发展“既包含着客观事实也包含着主观选择,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①发展是一种主体性的社会历史实践,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性与多样性、量变和质变、客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不同国家的发展观具有不同的呈现样态。不同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发展观思想,包括刘易斯等学者提出的关注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穆尔达尔提出的重视社会多种因素的多维综合发展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佩鲁倡导的关注人本身的新发展观等。发展观与政党、国家以及个体的发展紧密关联:于政党和国家层面而言,政党的发展观决定和影响着政党以及国家的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与发展实践;于个体层面来看,“一种发展观基本上规定了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界域: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理念、价值与实践),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样态、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观念、信念与之相适应。”^②发展观属于统揽国家、个体发展的总体

黄一玲,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上海201620)。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教育部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22JDSZK132)、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C2021098)、华东政法大学校科研项目(21HZK041)的资助成果。

①麻海山:《“发展”的哲学解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袁祖社:《“现代性”发展观念及其生存逻辑的深刻弊端与历史反思》,《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

性议题。考察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政策等的历史演进,有助于勾勒党的发展观的历史演进脉络,在历史变迁中深刻把握党的发展观,更好地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演进历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基本动力分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矛盾的转变以及人民需求的增加催生不同的发展观,推动发展模式发生演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①党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彰显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推翻“三座大山”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演进的历史原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 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形成的历史原点(1921—1949 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之伟力蕴含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塑造了党的人民性底色,也映射着立党为公的历史原色。在理解党的立党为公、初心使命之时需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民”是谁?哪些群体、阶级和阶层属于“人民”?对于这一问题的理性认识决定着党能否真正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近代积贫积弱之中举起了革命大旗,力图推翻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党在曲折的革命斗争之中对“人民”范畴的界定是一个逐渐清晰完善的过程。1927 年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专门论述了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党建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积极构建工农联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早期,党主要将工人和农民纳入“人民”范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中,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都纳入人民范畴。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②毛泽东认为,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要尊重群众、让群众的潜能充分发挥。^③1943 年毛泽东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在认识层面明确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同时从方法论层面论述了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强调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④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传家宝,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要素,它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充分体现出党始终坚守的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成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制胜的重要因素,为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演进历程

1. 党领导人民构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1949—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面临着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在 1954 年召开的

①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68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094—1095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80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7 页。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将当时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化”目标。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人民迫切的愿望,人民的发展愿望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同向同步。实现国家现代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也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人民对于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有着强烈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与党领导人民急于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诉求相契合,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现代化主要包括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依据自身国情,采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成长因素自然孕育的结果。中国在当时生产力落后背景之下难以采用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是符合国情的选择,而社会主义制度为这一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制度条件。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创造性地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制度和政策,利用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经济”的思想。^①通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公私共同发展等政策,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时代在发展模式上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主题,以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动员机制为推动力,调动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然而“文革”时期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发展生产力角度来看,在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之下,不是去改革生产关系,而是诉诸频繁的阶级斗争运动,制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发展路线,对国家各项工作造成了损失,从而阻碍了正常的发展进程。

2. 党通过改革驱动型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1978—2000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明确“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改革驱动发展,即通过改革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合国情的旧有制度并探索制度创新以充分激发与释放改革红利,推动国家全面发展。党在原先“两步走”现代化战略基础上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发展生产的思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②同时“南方谈话”中又将解放、发展生产力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论之中。在发展的价值主体上,摒弃了过去物本的发展观,将人民群众置于发展的价值主体地位上。邓小平指出:“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③邓小平强调,“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④,并进一步提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经济

①武力:《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7页。

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生活标准的统一,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邓小平所提出的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都强调了对发展的价值主体即人民的发展利益。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发展观的鲜明特点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通过对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体现出显著的改革驱动型发展特征,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道路。

3. 党坚持“三个代表”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2000—2012 年)

20 世纪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明确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推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准则与依据,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坚持以党建引领各项发展,将优化党群关系作为党的工作的着力点,将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维护人民发展利益的具体实践有机融合,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21 世纪伊始中国进入发展的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国共产党人以积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在对发展内涵、发展本质、发展方式等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的价值主体层面上,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且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真正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历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最高目标的理论原则,是对发展的价值主体认识的升华。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扭曲发展的反拨。”^①科学发展观所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关系上认识的深化:“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发展上,生产力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基础。”^②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探索人类和谐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了党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认识和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与狭义的发展在内涵和本质上有了较大的不同,虽然依然突出发展课题的优先性,但是已经上升为一种全面发展的辩证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辩证地对待发展和引导发展,深刻反思了人类冲突型发展道路带来的生存危机和困境。”^③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从过去将发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扩展到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全面发展,即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④。从过去粗放和外延式发展转变为集约型科学发展,注重各个领域的全面协同发展,从而有效避免步入“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

4. 党以新发展理念建设人民美好生活(2012 年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对于党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制定国家大

^①陈学明、罗骞:《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②陈培永、严文波:《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与新发展理念的新意》,《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③陈丹、岳爱武:《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价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经济视野》2014 年第 19 期。

^④《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396—397 页。

政方针的重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围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着眼新的发展实践,不断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布局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和美好生活建设为核心内容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

十九大报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解决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会议文件中特别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新时代党所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立足当前国情,明确了发展的着力点。在发展动力上,党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倡发挥人民的自主能动性,激发人民的创新活力,持续推进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党强调城乡以及各区域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现国内外联动发展。此外,党倡导共享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体现了发展的正义性;而凝练了人民对美好生活期许的“中国梦”更是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梦想紧密相连,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掠夺性、排他性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体现了新时代发展观的深化、拓展和升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新的影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党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着眼于高质量发展作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不仅降低了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生成逻辑

发展不是孤立的过程,它内嵌于一定的制度、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构成的整体性环境之中,是一个历史性螺旋上升的过程。政党发展观的生成也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党领导人民推动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生成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与历史逻辑是辩证统一的。

(一)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生成的理论逻辑

在现代化的叙事话语体系之中,政党叙事无疑是其中的核心话语。政党是近代以来组织现代化的中轴力量,政党的发展观必将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何为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这是发展观需要回答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不同解答,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路径。恩格斯曾指出:“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②发展观亦是如此,不同时代的发展观既反映一般发展规律和现代化规律的共性内容,也反映不同时代的发展诉求,并由此塑造着一个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发展轨迹。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造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伦理”。^③ 亨廷顿指出,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政府行为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以维护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8页。

^③ 习骅:《做一棵低头的稻穗》,《人民日报》2016年8月17日,第4版。

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难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党的发展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有关发展的本质、目的和内涵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包括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战略、社会发展目标以及人的生存发展意义指向等,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发展命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考,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具体实践以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总结。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遵循资本逻辑,阶级性非常鲜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只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成为“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它并非资本逻辑的“附属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显著区别所在。

社会发展进步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基于生产力决定论,而是对人发展程度的衡量,需要在消灭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同时对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予以关注,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实践活动的历史。党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重视人民在发展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主体、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生成的文化逻辑

文化作为软性的精神力量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先进的文化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国古代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注重民生、顺应民意、重视民心,是儒家思想的构成要素,是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需要加以重视的思想文化资源。《淮南子·汜论训》指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齐民要术》提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荀子指出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这些朴素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积淀的体现,为党所吸收、借鉴并实现了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成为党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重要的历史文化来源。

党除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民为本等积极要素之外,同时积极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西方哲学很早就开始研讨人的发展问题,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阐释“人类发展”概念的内涵即促进人类才能的最大发展。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秉持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人本学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促进了民主和法治建设。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存在其历史和阶级层面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基础上汲取人本主义思想精髓,否定了抽象人性论、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以社会实践的人为逻辑起点形成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理论。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紧密结合中国发展最新实际,与时俱进,既考虑个体进步以及国家发展的现实利益,同时又能着眼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三）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生成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一直贯穿于党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党领导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

上生成的。回顾历史,党带领人民经历了从照搬僵化的苏联模式到依据国情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从强调“物”的因素到注重“人”的因素,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追求解放、发展生产力、强调新发展理念,从单纯强调物质财富增长到注重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全面发展,从追求粗放型发展到追求公平、高效、可持续、高质量集约型发展的曲折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并未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而是积极构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党相应地在发展观上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贫困问题以及赶超诉求使得当时党的发展观偏重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所塑造的新制度环境使党意识到各领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倡开放意识,紧扣时代脉搏,发展并完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核心伦理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拥护与否、幸福与否、满意与否、答应与否作为评判发展成败的重要标准。党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协调人与社会、自然关系为目标,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复杂关系,构建新时代新发展格局,有效应对疫情挑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在生态、文化、社会发展上突出“惠民”与“利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了遵循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相一致。与此同时,新时代党将发展的视野扩展至全球,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力图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成功开辟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三、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价值意蕴

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科学总结社会发展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深化了党对人类社会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一) 从物本发展到人本发展: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理论价值

发展是人类永恒探索的主题,如何发展是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发展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发展不仅满足人的需求,同时能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在工具理性上,发展观需要回答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在价值理性上,发展观需要明确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党在发展观的探索中,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以人本发展为先导,是对否定人的创造性、自主性的物本发展思想的克服与超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人类思想史上,旧唯物主义无视人的主观创造性,而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的视角,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 马克思强调人是社会的目的和归宿,社会离开人的发展将无从谈起,人的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衡量尺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党强调发展观的实践性和人本转向,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对异化和片面畸形发展;提倡人的行动自觉自愿自主,反对物统治人和客体支配主体,^①反对各种形态的不利于人类的短期性发展、排他性发展、奴役性发展、功利性发展、失衡性发展等,提倡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是对“以物为本”扭曲发展的反拨,真正体现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历史观和现代主体性价值取向。^②

进入新时代,党面对发展中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不采用排外性、歧视性和毁灭文化多样性的增长模式,将物质型发展指标与人的价值相统一,充分凸显了党的人本发展思想。党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和统筹性,追求公平的共享发展,在发展模式上注重通盘考虑人、社会、自然的绿色和谐整体发展;统筹考虑当代和未来发展、国别和全球发展、集体和个体发展;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平衡人对自然的索取与对自然的回馈,协调个体和集体利益,协调物质和精神生产,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党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层面上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从而实现了党的发展观的不断跃升。人民不仅是发展的动力主体、目的主体,更是发展的利益主体、责任主体。党坚持一切从人民角度出发,始终依靠人民力量,坚决维护人民利益,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彰显出人民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

(二) 秉持人民至上:彰显“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伦理价值

党始终毫不动摇地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原则,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称:“他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③可见,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代表、维护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人民”的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始终。马克思关怀的“人民”是唯物史观角度的“现实的个体”,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现实生活中实践着的人。“人民”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体的集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是极具伦理关怀的思想家,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给予人民关怀,致力于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造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伦理”。^④马克思指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⑤亨廷顿也曾指出,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政府行为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难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民幸福是人民现实的自由,是“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⑥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⑦党的立场、国家立场以及人民立场高度一致。回顾历史,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在成立之初就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传家宝。党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群众路线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①陈刚:《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及其当代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②陈学明、罗骞:《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④习骅:《做一棵低头的稻穗》。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利益。其中所指的最广大人民是指所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人民,既包括工人、农民,又包括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充分体现出党在代表人民利益时的广泛性,而非仅代表少数人的部分利益。江泽民曾经强调提升党的领导水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①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符合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特定的具体的人。”^②党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的发展主体地位,坚持为民、利民、民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传承下来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体现了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是党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付诸实践的最显著成果。

(三) 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理论是时代的声音,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发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各种议题的回答。立足时代转折的伟大际遇,党要领导人民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精准地切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的现实中去回答发展这一重要的时代课题,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气息。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将人民置于国家发展的主体位置,将人民群众的愿望、利益诉求和创新实践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能够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发展的价值主体上,党的发展观在本体性价值意义上的飞跃集中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实践,体现在美好生活的实践之中。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③新时代党的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的、发展依靠的对象以及发展成果享有等问题,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矛盾,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发展实践的宝贵经验总结。人民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党对发展主体和发展核心价值的认识升华。因为人民是美好生活的创造主体,也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目标指向上必然指向美好生活,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美好生活理念共同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发展观之中,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构成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谱写出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奋斗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力量的原理,把主体力量与价值追求,紧紧契合在人民权利和人民利益的实现中”^⑤,在人与社会统一的层面上体现了发展的主体价值取向。

^①《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

^③陈振凯等:《习近平谈“人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11日,第5版。

^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求是》2015年第22期。

^⑤孙小龙,王程:《唯物辩证法视阈中新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寓意》,《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人民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推动了诸多创新性实践活动的开展。人民的首创精神与国家改革发展同向同行,激荡了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努力实现全面均衡高质量的发展,注重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凸显了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统一,彰显出发展对于新时代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维护人民在发展中主体地位的时代价值意蕴。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受到社会矛盾运动的影响,发展模式的选择与社会矛盾的转变以及人民需求密切相关。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以解决不同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发展课题为着力点,紧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充分体现出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不变初心以及党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

(责任编辑:陈 雪)

The CPC's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Generation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s

HUANG Yiling

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narrative of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view held by the ruling party influences the track of a country's moderniza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e terms of embeddedness.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mod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people's needs. From adhering to the mass line model of developmen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o the late-developing and exogenous model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rom reform-driven development to people-oriented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CPC has always stuck to represent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o the unity between the subject of value and the subject of practice in pursuing development. In its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leading the people to carry out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Party combines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a's national realities and absorbs the essence of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western humanism.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law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actively solve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form a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 people; development view;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tion logic

About the author: HUANG Yiling,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